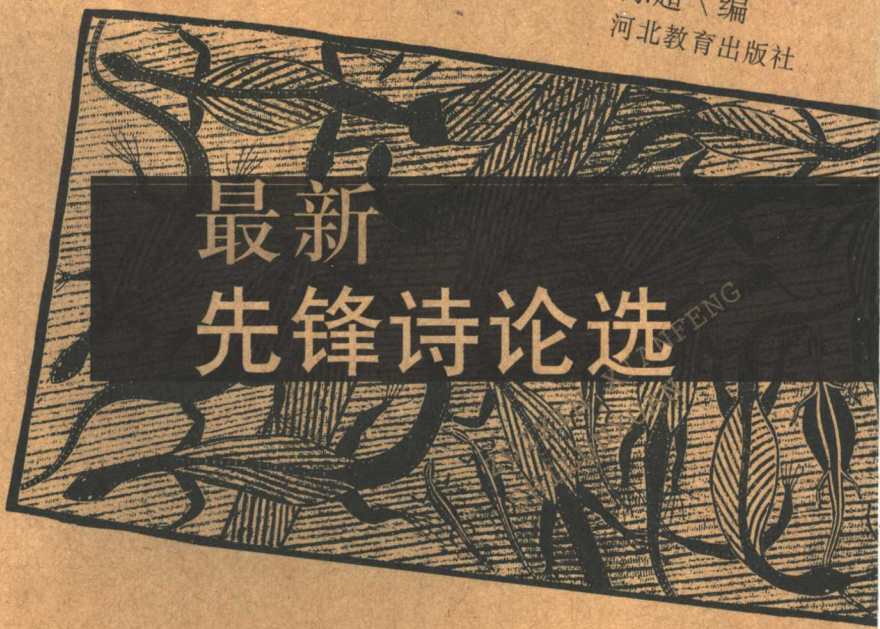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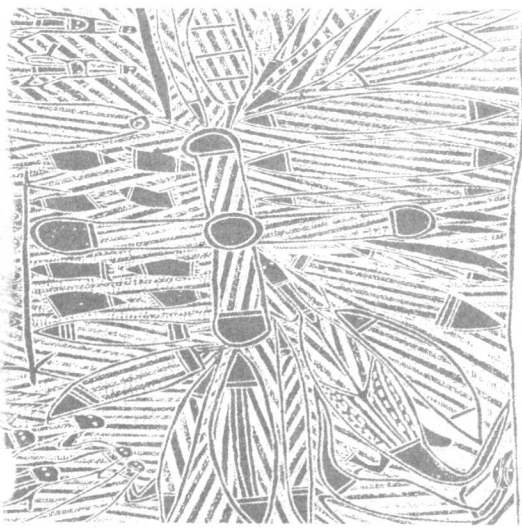




陈超 \ 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

最新 先锋诗论选





最新 先锋诗论选

陈超 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新先锋诗论选/陈超编. -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4
ISBN 7-5434-5013-5

I. 最… II. 陈… III. 诗歌-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4972 号

书 名	最新先锋诗论选
编 者	陈 超
责任编辑	郝建国
装帧设计	郝 旭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天润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石家庄市北二环西路 201 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3.5
字 数	493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5013-5/I·826
定 价	47.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	徐春芳 陈志伟

写在前面

“最新先锋诗论选”选入的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先锋诗学文本,力求史料性、专业性、时效性和可读性并举,勾勒和反映世纪之交中国现代诗学发展的面貌,为此后诗学的继续精进提供必要的参照。

但是,这里所说的“最新”,却不是一个绝对的价值判断。编者只是在“差异性”和介入当下创作的“有效性”的角度,使用此语词的。很可能我更心仪于中国古典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但我知道,它们再好,也无法代替我们对当下诗歌创作及诗学批评现实的思考。

规行矩步于“古典”或“西方”诗学的已成范式,的确使许多诗评家立论稳妥、言说有据;但是其讨巧的一面也是明显的。似乎诗学和诗歌的标准已经被彻底厘定好,并被他们掌握,剩下的只是以此标准来“量裁”当下中国的诗歌创作。这样一来,既有的范式不但没有激活,反而遮蔽乃至“删除”了批评家对具体历史语境下的诗歌的思考。而且,具体到批评写作,还常常会造成批评家多依赖于自己诗学文本中不同引文的关系的递进,来代替——如果不说“冒充”的话——个人逻辑运思的真实推进。如果说这就是所谓“诗学”,我宁引另一说,将其称为“诗学学”。我不否认它们的价值,但本选集显然不太是它们合适的去处。

诗学文本介入当下写作语境的活力和有效性,是我编选此书的前

提。在重读这些诗论文章时,我会不断回想起中国先锋诗歌和批评从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所走过的激动人心的道路。同时,我也清晰地感到,从价值确认,诠释模式,运思向度,到措辞特性上,先锋诗歌批评正在经历着一个较大的转变。

在此前,诗歌批评或是贴近社会学和文化阐释,或是固持于形式研究,或是专注于审美感受的鉴赏。这些批评文本各有佳境,但也有明显的缺陷——三者之间很少被真正有效地打通,至少未曾出现有说服力的先例。当然,诗歌于社会、历史、文化大有关系,其本体形式也是诗之为诗的存在理由;但是,说到底,真正有力的诗学,探讨的应是综合性的事关“写作”宏细诸方面的问题。而要对“写作”这个大概概念进行整体的考察,则必须树立“内容是完成了的形式,形式是达到了目的的内容”或“舞蹈与舞者不能分开”,这个不简单二分的、求实准确的理念。缘此,到90年代,诗歌批评家们围绕“诗歌写作”问题,大都感到了以往批评中将本体与意义“分治”的做法,是“不顺手”和“不够用”的。他们开始尝试转入一种难以归类的“综合批评”。

本书着意体现了这一变化。诗人—批评家(在先锋诗界,这二者的身份常常是重叠的)对生存和语言的双重关注,使他们的诗论写作兼容了具体历史语境的真实性和诗学问题的专业性,从而对语言、技艺、生存、生命、历史、文化,进行了扭结一体的思考。这样,在先锋诗论有力的文化批评和修辞学批评中,就不但具有了介入当下创作的有效性,而且还对即将来临的话语可能性给予了“历史想像”的参与。自觉地将对美学的省察与对生存的省察交织在一起,是一个时代诗学富于活力的标志。相信这部书的读者会清晰地感到这个转变所带来的更为开阔的批评视界。

与对有效性和活力的追寻相应,在这部书中我们还会看到先锋诗学内部批评风气的建立。在20世纪80年代,对先锋诗歌的批评(批判)主要来自陈腐的主流文化。它的“任务”是考察诗歌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或检视诗歌在道德意义上是否“积极向上”。面对这种具有超强权力话语背景的批评,先锋诗学内部曾体现了彼此的激励和团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先锋诗学内部各具差异性的写作理念,不需要彼此间的深度辩难。90年代以来,在先锋诗学内部,展开了时隐时显的一

系列论争。本书适量地收入了这些论争中的较有理论性的文本。我们看到,抽象地说,在“诗就是诗”,“诗要忠于自己的本质”这一点上,大家没有分歧。至于这个“本质”是什么?则言人人殊。这样,论争的焦点就通向先锋诗歌内部不同的话语方式和“求真意志”间的差异,而非通向以往庸俗社会学的工具主义驱策。我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诗学论争中理论含量、经验含量的增加,以及批评界的某种成熟。而要从价值论上来评判争论各方立场的“高下”,作为这部力求客观的诗论选的编者,我显然不是合适的角色——且将它作为继续深入地进行“潜对话”的机缘,礼貌地留给时间和读者。

本书编者还欣慰地感到,在对批评姿态或对批评家角色的确认上,当下先锋诗学界体现出的某种自觉。批评家普遍坚持了批评的自足性,亦即批评与创作的“平行”和“对话”关系。批评为了更限度地实现自己的价值,有必要重新确正自己。诗学批评不是诗歌创作单纯的附属和辅助,批评家也不是诗人的“仆从”或“西席”。如果说过去曾经如此,那是由于真正意义上的诗学批评没有合理、合法地建立起来。批评与创作的合理关系只能是平行和对话;一个自觉的批评家,应具有既深刻介入创作而又能独立于创作的精神和书写能力。对批评价值、职能和过程的自觉,使一些批评家(包括诗人批评家)得以以更敏锐、更自如的心境提出了真正属于自己的问题。在这部书中,我们会看到诗歌批评在获具相对的自立后,焕发出的自身的分量与魅力。

最后,我想说的是,可能会有许多读者对本书中一些文章的“文类”性质感到疑惑。它们写得似乎充满感性的描述,迸涌着激情,甚至是诗性的想像力。他们会问,这是论文吗?批评家的话语方式可以是这样的吗?

由此,我想起罗兰·巴尔特在《批评与真实》一书中揭示的一个有趣的事实,即如今许多有效的批评家也成了“作家”。这个说法可能会使那些“学院派”理论家蹙额,但若是我们换一种表述,就会看到它骨子里的真确性。按照巴尔特的话,“作家”不应以他所书写的文类为特征,而只应以某种“言语的自觉性”为特征,他体验到语言的深度,而不只是它的工具性或美感。以前,批评与创作是被一个古板的神话隔离了,而今天的作家与批评家处于同样缠绕——也很可能是“欢愉”——的写作

环境中,挖掘着同一个对象:语言。我想对那些疑惑的读者说,如果这类文章能够给你带来充满才智的陌生的思考,异样的阅读欢愉和冲撞力,你又何必计较它属于哪种文类呢?我之所以在本书中少量地编选了此类文章,还由于它们在“写作”的意义上,也体现了当下先锋诗学措辞特性的某种“暧昧”转变。

在《最新先锋诗论选》的酝酿、选题、组稿和编辑过程中,诗歌批评家唐晓渡给了我一些有益的建议,还有许多诗人—批评家惠寄了大量图书杂志,在资料上给予我无私的帮助。因此,这部书的编论,亦可视为先锋诗人—批评家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陈 超

2002年3月12日

目 录

写在前面	陈 超 (1)
求真意志:先锋诗的困境和可能前景(节选)	陈 超 (1)
语词写作:思想缩减时期的修辞策略	陈晓明 (12)
体验的亲历、本真和自明	
——生命诗学	陈仲义 (31)
90年代诗歌:另一意义的命名	程光炜 (50)
新诗在历史脉络之中	
——对一场争论的回答	程光炜 (63)
一场诗学与社会学的内心争论	耿占春 (69)
论民间(节选)	韩 东 (80)
如何对诗说话	洪子诚 (91)
在“亡灵”与“出卖黑暗的人”之间	
——关于90年代知识分子个人诗歌写作	胡续冬 (94)
叙述中的当代诗歌	姜 涛 (108)
没有终点的旅行	
——也谈70后诗人	敬文东 (118)
神话写作与反神话写作	李 震 (134)
乌托邦、理想主义和诗歌	刘 翔 (148)

'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

知识分子身份	欧阳江河 (165)
当代诗的升华及其限度	欧阳江河 (186)
我理解的90年代:个人写作、叙事及其他	孙文波 (200)
拓殖、收摄与在路上	

——现代汉诗的本体特征及语言转型	沈 奇 (212)
五四新诗的现代性问题	唐晓渡 (220)
90年代先锋诗的几个问题	唐晓渡 (230)
个体承担的诗歌	王光明 (245)
知识分子写作,或曰“献给无限的少数人”	王家新 (249)
阐释之外:当代诗学的一种话语分析	王家新 (265)
当今诗歌:圣化写作与俗化写作	吴思敬 (276)
诗学中的九个问题之我见	西 川 (280)
写作处境与批评处境	西 川 (295)
写作的权利	西 渡 (313)
90年代诗歌:抱负、特征和资料	肖开愚 (328)
丰富而又贫乏的年代	谢 冕 (345)
现代诗歌的分析与展望	严 力 (355)

磨镜

——中文当代诗的三重对称	杨 炼 (361)
暗淡与光芒	杨远宏 (367)
当代汉语诗歌中的后现代性	杨小滨 (375)
从隐喻后退	于 坚 (389)

诗歌之舌的硬与软:关于当代诗歌的

两类语言向度	于 坚 (402)
后朦胧诗: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	臧 棣 (419)
现代性与新诗的评价	臧 棣 (437)
再谈“黑夜意识”与“女性诗歌”	翟永明 (446)
90年代诗歌及我的诗学立场	张曙光 (448)

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

——当代中国诗歌的元诗结构和写者姿态 张 枣 (455)

我们的新诗遇到了什么问题? 郑 敏 (473)

秋天的戏剧

——关于诗人对话素质的随感 钟 鸣 (488)

90年代中国现代诗走向 周伦佑 (504)

“知识实践”中的诗歌“写作” 周 瓚 (511)

求真意志：先锋诗的困境和可能前景（节选）

陈 超

（一）深入当代

在近年来的先锋诗歌写作中，诗人面临着许多彼此纠葛的情势。其中最为显豁的困境是：如何在自觉于诗歌的本体依据、保持个人乌托邦自由幻想的同时，完成诗歌对当代题材的处理，对当代噬心主题的介入和揭示。

敏锐的诗人会感到，近年大量的先锋诗歌从调性到具体的个人语型，都发生了大规模迁徙。历史的错位似乎在一夜间造成巨大缺口，尖锐紧张地楔入当代生存的诗已不多见，代之以成批生产的颂体调性的农耕式庆典。在本体上自觉于形式，在个人方式上靠近沉静、隐逸、自负的体面人物，是这些诗的基本特征。这像是一种“正统类型”的现代诗。中国士大夫的逍遥抒情再一次被重新忆起，演绎，仿写，纂述。诗歌据此成为美文意义上的消费品，或精致的仿古工艺。

基于最起码的人文背景体谅，我理解近两年这种农耕式庆典诗歌出现的意义。作为对权力话语的隐隐抗议，它体现了诗歌肌质的纯粹性，诗歌精神的超验性；作为对集约化拜金时代的不屑，它体现了诗人对淳朴自然、老式义德的追复。但是，体谅永远不应代替我们发言的逻辑。如果不是把诗歌作为一种逃避生存的快乐行当来谈论，那么，诗歌对当代生存题材的有力处理，对时代噬心主题的介入和揭示，就成为我

们目下必须回答不容滑头的问题。

因此,我想说,当前甚至世纪末汉语先锋诗歌面临的考验,主要不是在生存的双重暴力(权力话语和拜金浪潮)压迫下,如何逃逸,另铸唯美乌托邦的问题;而是更自觉地深入它、将近在眼前的异己包容进诗歌,最终完成对它的命名、剥尽、批判、拆解的问题。勇敢地刺入当代生存经验之圈的诗,是具有巨大综合能力的诗,它不仅可以是纯粹自足的,甚至可以把时代的核心命题最大限度地诗化。它不仅指向文学的狭小社区,更进入广大的知识分子群,成为影响当代人精神的力量。汉语先锋诗歌存在的最基本模式之首要,我认为应是对当代经验的命名和理解。这种命名和理解,是在现实生存——一个人——语言构成的关系中体现的。要让语言对前二者的呈现接近和达成某种“真实”,就离不开对词语当代因素的倾心关注。因此,今天我们的诗歌,应当更广泛地占有当代鲜活的、“日常”交流的、能激活此在语境的话语,而不仅仅是为自己划定一套唯美的、相对稳定的语言“纲领”,诸如黄金、火焰、光芒、粮食、磨坊、玫瑰等。

这里必须紧跟着指出:我与目下那些仅从表面的语素重复,来指责先锋诗歌形式雷同的观点是绝然不同的。在某个特定时代,一系列核心语象成为诗人反复涉入的元素或原型,是诗歌内部机制自动性的反映。因此,不存在如何人为抑制它们的问题,而只存在如何通过个人的生命体验来加深或改写它们当代内涵的问题;不存在是否符合某一类老式读者阅读类型的问题,只存在通过个人对它们的创造性使用,去同时创造其读者的问题;不存在我们能否使传统不朽的问题,只存在传统是否能新新顿起经由当代激活、扩大和更新注意的问题。——在此一基点上,我们考察一项语境的立场,即是其当代性的强弱;考察一个意象的立场,即是看它是否将一个古老的语辞化为个人“发明”般的“新词”来使用。不错,海子的诗大量地突出了“麦子”、“火焰”、“太阳”、“马匹”等。但深入细辨,我们会发现,他是经由自己的生命心象来重新处理这些语辞的。它们奇妙、刻骨、深展、多向度,成为张力极大的、可变的和间接的功能场。在这里,隆起的不是这些语辞的字典含义和美文含义,而是对现世生存经验的更高程度的占有与综合。但是,我仍然要说,海子是不可重复的。特别是对生活在今天的我们而言,长久地沉溺

于浪漫主义二元对立的话语型式也是值得警惕的。

接着,应该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即一个诗人的话语要素是从哪里来的?在一个诗人早期的写作中,谁都离不开对先代既成诗歌话语的模仿、体悟,特别是对某些原型语象的移用。即使在那些优秀的诗人身上,我们也会发现这一明显的文本间性特征。但是,如果我们长期作为有寄主的描红者出现,而不是从现实生存和生命的原动力出发迹写诗歌,我们不仅不能获具被仿写者的精神深度,甚至即使在形式上也谈不到高标准的自觉。所谓借鉴,一定是对健全的审视、剥离而言的。离开现实生存/生命话语的历险,任何真正的借鉴都谈不上。据此,我说,一个优秀诗人的话语,既是个人隐语世界的呈现,同时也必以此时代流行习语做伴生物。换言之,是诗人将日益变滑变薄变滥的大众信息语言,上升为本质的,根源的诗性话语。艾略特《荒原》中的“对弈”许多纯是当时流行“习语”,请评价这“习语”的价值吧!

先锋诗歌要有勇气和力量直接地、刻不容缓地指向并深入时代。这样做是危险的,但不这样做却更为危险。先锋诗歌要创造和发现当代话语的全部复杂性,要扩大而不是缩小母语语型,要更广泛地占有语辞的命名权而不是向权力主义者和庸众退让妥协!因此,提炼个我灵魂话语与使用并颠覆僵滞的信息交流话语不是简单地对立或互不相关的。而是两者共时包容的。在现代社会,先锋诗歌是最难以被某种强暴势能“利用”的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诗歌就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难以“利用”,至少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无关痛痒的个人迷醉术,权力主义者可以放心而忽略不计;一种是更锐利更广阔的精神离心历险,在对生存的衡估和揭示中,持有诗歌独一无二的“思”的重要地位。它更内在更准确更奋不顾身地嵌于时代之中,乃成为独立于有限性和国家主义之上的神圣行为。它的重要性不只是单向的挑衅、叛离所达成,而是整体包容的去创造新的精神历史,并以对人类伟大精神共时体的衔接为标志的。从形式上说,这也是先锋诗歌得以以先驱身份出现的缘由。所以,我不理解诗歌对当代题材和历史个人化的处理和把握为何使许多诗人视为畏途。处理当代主题和现实经验为什么一定会使诗歌变得不纯呢?只有创造力贫乏的诗人才需要凭借“已成”的类型化/工具化的美文语辞来保障诗歌的“纯粹”。而真正杰出诗人,则将母语

更广泛地涉入诗歌——先锋诗歌的纯粹是发展中的,不断向未来打开的“纯粹”,对语言现在进行时的执取、洞彻,正是其自我把握、自我确立的一个关键标志。先锋诗歌的“纯粹”,是当代全新经验加入并为起点的“纯粹”,是自由的想像和生存现象异质混成的复杂整体的生命空间,而不是文化闲人的话语遣兴及梦境飘流。

现在,让我们回到文章的开头。我说过,当代先锋诗所有困境中最基本的困境,乃是如何在自觉于诗歌的本体依据、保持个人乌托邦自由幻想的同时,完成诗歌对当代题材的处理,对当代噬心主题的介入和揭示。我对这一困境的提出,并不是基于现在重新提起的“开放”幻觉。诗歌作为求真意志的语言历险,永远离不开对现实生存和生命的揭示。它的此在性是与生俱来的,而不是被任何即时性外在情势的变迁赐予的。因此,在任何时候,它也不能被收回!否则,对外在情势期望过高,会使我们的诗歌再一次成为被“利用”或被借口抹掉的东西。说到先锋诗歌对当代话语的占有,我不是指那种表面意义上的“时代感”、“主旋律”,而是指存在主义哲学意义上的个人与当代核心问题在语言上发生的冲突、互审、亲和等关系。它是生命和生存的当代,不是技术和物质的当代;它是异质冲动的当代,不是插科打诨的市民的当代。在我们一闪的生命中,最终有谁能够像米沃什那样肯定地说出:

“如果不是我,会有另一个人来到这里,试图理解他的时代。”

但愿我们在未来的时候,也能这么说。

(二)可能的诗歌写作

20世纪80年代以降,诗歌的进展可堪嘉许。个体主体性的确立和对诗歌本体的自觉,是这一进展的两项成果。然而,随着具体历史语境的变化和我们对深度写作的探寻,诗歌又与新的困境相遇:我们的诗是纯正美丽的,但面对活生生的时代真实性,历史的个人化,这些诗的承载力远远不够。诗歌素材上的洁癖和表达方式的单一,是问题的现象层面;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我以为还与我们对诗这一古老文

体，在当代新的写作可能性探求不够有关。在我们的观念中，诗歌是主观“表现”艺术（抒情性；以及那种以“妙悟”为指归的隐蔽抒情）。尽管诗人们“表现”的话语形式及意味有高下之别，但它们却有同等的根基：表现，作为一种写作姿势往往通向主观和绝对。由此，诗人与读者达成了默契——“我是在表现，你们是在接纳这种表现”——即使有时读者排斥诗人所表现的内容，但他同意诗人预设的姿势、发话的“语法”。我承认，这是这时代“阅读期待”的一种进步。但问题还有另一面。我们看到，长久以来诗人过分享受了这一默契，流弊所及使写作成为“孩儿国”的恣情表达。他单一、绝对地歌唱，叹息，自慰，亵渎，邀宠，斥骂……以物而喜，以己而悲，暗中以为自己拥有着诗的“真实性”的全部解释权，具体生存的真实和人的情感经验的复杂性却被悬置一旁。表现，这一具有无限选择可能的观念，在这里被导向了主观和绝对自我抒情，或对抒情的反向寄生（那些出于情绪化二元对立的“反抒情”乃是一种更大的抒情）。

这样的诗歌姿势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又有虚弱和不成熟的一面。它降低了写作的难度，抑制了灵魂求真意志的成长，使诗走向新一轮集约化、标准化生产。它难以有效地处理复杂的深层经验，和把握具体生存的真实性，丧失了诗的时代活力。更严重些说，它在不期然中也以另一种方式加入了“集体遗忘”的行列。或许诗人会说，我的写作对我而言具有真实性。但在我看来，诗人情感的真实不等于诗的真实。前者指向诗的发生学，后者指向诗的效果史。后者乃是问题的全部致命所在，它使诗歌摆脱诗人而具有了自我确证自我持存的客观价值规范。

面对这种主观和绝对的抒情写作，我感到诗在变成单向度的即兴小札，消费时代某些文化人的遣兴，而不是与时代生存和人的生命经验彼此呼应或观照的“特殊知识”。因此，我认为有必要扩大诗歌文体的包容力，由抒情性转入经验性，由不容分说的主观宣泄，转入对生存和生命的命名乃至“研究”。我想将这种写作称之为准客观写作（不消说，任何类型的写作都不会没有一点主观性），怀疑和相对立场的写作。这种写作要求诗人抑制单向自我的抒情姿势，忠实于成人精神世界的复杂性、矛盾性和可变性，在诗中更自觉地涉入追问、沉思和反讽、互否因素。诗人将自我置于与具体生存情境对称的立足点上，冷静、细密、求

实地进行分析和命名,探究经验的多重内涵,呈现其各种可能性。这里诗性的沉思不同于人文学科要求的明晰和判然。它是或然的,它不“解答”问题,而是经由诗歌话语的观照,捍卫住问题的复杂性,使之保持活力,以不被权力话语和“技术时代”简化和抹杀。与此相应的修辞法和结构法是互否。它使诗歌中不同意向间发生摩擦、盘诘,结构内部设置不同的“声部”,在更为复杂的语境里,呈现经验世界的整体性,最终实现诗歌更高意义上的自足。这样的诗当然是有难度的,但值得一试。它要求诗人不仅要有修辞想像力,同时也要有“历史想像力”。这一双重考验有助于使诗歌形式本体论趋向与之相应的生命一生存本体论。或许这种实验将松动目下诗歌的文体类型学和限定性,但会为这时代的诗歌写作注入重要性,并提供持久的价值感。

与主观和绝对的抒情方式伴随而来的困境是,目下诗歌的词汇量在以空前的速率减少。这种减少是一种奇怪的减少——它以表面上的增大为掩饰。稍作考察我们就会发现,目下诗歌中的词汇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与情感有关的形容词,另一类是“美丽的”自然物象的名词。这两类词在诗歌中的确日益丰富花样翻新,但从根本上说它们是可类聚的、量上的补充。或许在诗人们看来,前者直接指代情感,后者天然具有“诗意”。因为它们在整個词义使用的历史中已积淀下了其抒情性,具有预先注入的“诗性”优势,诗人何不利用这一优势?但我越来越感到,或许正是这种所谓“诗意”,这一套固定的语言纲领,使我们的诗歌缺乏旺盛的时代活力和生命经验的重量。对这两类词汇的倚重,同时也导致了诗歌骨子里的“不及物”及诗歌语型的贫乏,仿佛大家在写同一首诗。诗歌作为对生命和语言无限可能性的洞开,其话语领域是无限广阔的。优秀的诗人对这种广阔应有自觉承诺。我想,我们能否使一种有待在写作中揭示和命名的中性词涉入诗歌?能否吸收和接引俗语、俚语、口语和方言?能否在“构成性”的诗歌语型中糅入叙述和人际对话?这些或许有助于发展诗歌文体的混成力,使之成为时代生活的血肉之躯上割下的活体组织,而不是停留在“妙悟”的水平上。利用“已成诗意”的写作,是源于诗人对经典文本阅读的写作,它直接趋向他人写的“结果”,而不是通向使我们写作的力量。成熟的诗人应该能够在丰富灵活的不同语型中自如游走,这样的诗,会使我们感受到它与具体

生存的关系。它不仅是可能的，也会是现实的。

考虑到诗歌把握具体历史语境的真实性要求，我还期待能在诗中看到叙事性，那种碎片式的、冷静的、对“事件”的描述和探寻。这方面艾略特的叙事技艺对我们或会有启发。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直接处理日常“事件”。诗人成熟的心智使一个事件转化成了经典性的、对人具体生存情境的分析和研究。它承担了比事件更沉重的负荷。诗人既是冷静客观地叙事，又是戏剧性独白和深刻地命名。他将克制陈述、戏剧独白、沉思追问和引文嵌入扭结为一体，写作者的态度因“事件”本身的复杂性而变得迟疑，构成了诗歌巨大的包容力。这样，诗的叙事依恃的不再是单维的时间链，而成为各种声部间的争辩；诗具有了打动人心的生存力量（而不只是情感力量）。诗人是在叙述，但叙述不再是因果关系的交待，他与事件拉开了足够的距离，一边叙述，一边分析自己的叙述，写作成为朝向精确的求真意志的摸索。“情歌”在这里成为被重新研究的一个“新词”。这首诗，对叙事性反讽同样具有启示。它的整体运思是在反讽一面，但不像我们在叙事反讽中惯用的那样，简单地说法或揭示事件的乖张一面，而是以复杂的立场展现事件内部纠葛中不为人知的方方面面。在诗中渗入一定程度的叙事性，有助于我们摆脱绝对情感和箴言式写作，维系住生存情境中固有的含混与多重可能。如何使我们的诗更有生活的鼻息和心音，如何使之具有真切的、可以还原的“当下”感，如何使我们的话语保持硬度和韧度，并使之在生命经验中深深扎根，我想，模糊一下诗歌文体的界限，在其中自觉加入叙事因素，也是应予考虑的问题之一。

（三）另一种火焰或升阶书

毫无疑问，由实利主义技术竞争和权力重新构配带来的准商品社会，正在成为我们所面对的最强大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权力、技术、拜金三位一体的中国式集约化/工具化时代，文化的进一步荒芜和新的可能性都共时存在。面对这一突然裂开的空白，对先锋诗歌的考验从未